

## 《数学文化》帮助我实现数学梦

蒋 迅

我出生于一个数学教师家庭，从小就热爱数学。所以在高中毕业时，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。后来我考取了数学研究生，毕业后又到美国攻读数学博士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我最终转行到了工业界。当一名数学老师的梦想就永久地成为了过去式。

物转星移，我离开校园、离开数学已经很多年了，但心里一直是怀着一种数学情怀。于是在早九晚五的工作之余，我又开始写起了数学小品文，然后发给少数几位数学专业的老师分享，这其中就有《数学文化》的编委张英伯老师。张老师跟我同时进入北师大，我是本科，她是研究生。虽然我们在研究生阶段不是同专业的，但她的先生王昆扬老师是我的大师兄兼导师，所以我们来往比较频繁并成为挚友。记得是一篇《数学与音乐》的短文引起了张老师的兴趣。在张老师的鼓励下，我在“科学网”上开了一个数学博客。不过真正让我和《数学文化》建立密切联系的还不是张老师，而是主编汤涛教授。

原来在《数学文化》创办的初期，编委们手中的原创文章还不够多。汤涛觉得我在科学网博客上的几篇博文不错，希望向我征稿。于是他问编委们：谁认识这个叫蒋迅的人？正好编委会里有我的一位在马里兰大学攻博时的学长张智民。经过一番电话交谈后，我荣幸地成为了《数学文化》的一名特约撰稿人。有一个“六度分隔理论”（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Theory）说的是：世界上任何互不相识的两人，只需要6个中间人就能够建立起联系。看来对于两个数学爱好者来说，也许只需要一个中间人吧。

我的数学科普文章从第1卷第2期开始在《数学文化》上发表。一开始我是把在科学网上已经发表的博文整理后交给汤涛，慢慢开始有一些新创作的小品文投给《数学文化》。有一段时间里，连续几期都有我的文章，甚至一期里出现两篇。我比较得意的作品是《雪花里的数学》，发表在第3卷第4期上。我为自己能在数学领域里继续发挥作用而感到高兴。虽说是新创作的小品文，其实都是我很多年的积累。因为我是业余的数学写手，只能在工作之余找到一点时间，所以很多文章的草稿都压很多年了。渐渐地我的写作开始跟不上《数学文化》的出版节奏。说到这里，不能不提到另一位数学史专业的王淑红博士。我们在科学网上认识，然后一起写了一些文章。她发挥了在数学史领域的专长和妙笔生花的写作功底，与我合作又在《数学文化》发表了许多文章。这其中就有《数学家与音乐》（第5卷第1和第2期）和《万圣节说点与鬼神有关的数学》（第5卷第3期）这两篇。

还有一位《数学文化》的编委需要提到：数学史专家邓明立老师。邓老师



是王淑红的导师。在我回国休假的时候，邓老师请我去河北师大作了一次报告。记得那次不巧学校的宾馆客满。邓老师出面交涉坚持让我住进了宾馆唯一还空着的高级套房。我们见面后交谈甚密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后来我听说他调离河北师大去其他学校当领导了，希望他能继续在数学领域里作科研。那次我的报告题目是“现代折纸与数学”（相关内容见第6卷第2期）。我上一次作数学报告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所以我还是小有紧张。一个小时下来后发现效果还不错。主持讲座的苑立平老师告诉我，同学们反应很好：原来数学讲座还能这样讲。

在一定量的文章积累之后，我和王淑红决定出版一本数学科普书《数学都知道》。我们所用的大多数素材都来源于在《数学文化》上发表的文章。这个计划后来变成了一个三本的系列：《数学都知道》（1，2，3）。这套书在2016年12月由北京师大出版集团出版，王梓坤教授为本书题写了书名，张英伯和王昆扬教授为本书作序。《数学文化》发表了本书的前言和序言及张进先生的书评。为一本书开辟如此多的栏目大概是一种照顾吧。很多读者都是通过《数学文化》认识了我。他们开始叫我老师，尽管我告诉他们，我只是一个码农。但我的心里确实有一种成就感：我为数学科普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

现在应我的要求，我不再是《数学文化》的特约撰稿人。付晓青老师问我为什么坚持辞去这个头衔。我告诉她，真的是积累的素材已经用完，而我的写作速度又跟不上。何不让给更优秀的写手呢？虽然现在没有了这个头衔，我仍将继续是《数学文化》的忠实读者，继续为《数学文化》投稿。在《数学文化》创刊十周年之际，我感谢《数学文化》帮助我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也祝《数学文化》越办越好！



作者简介：

蒋迅，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学士、硕士，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。现在美国从事科学计算工作。